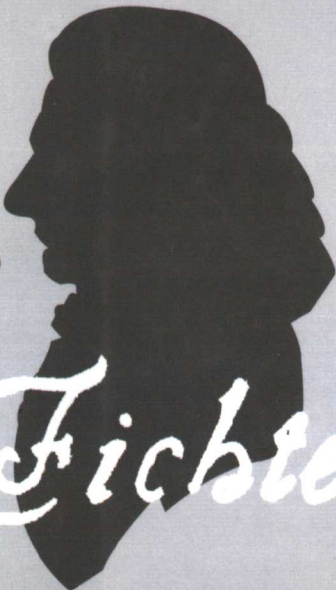




Fichte

**费希特
柏林时期
的体系演变**

梁志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希特

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

梁志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梁志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4

ISBN 7-5004-3813-3

I. 费… II. 梁… III. 费希特, J.G. (1762~1814)
—知识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219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冯式一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6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们的费希特课题组从 1994 年 9 月开始，到 2000 年 4 月截止，完成了《费希特著作选集》第四卷和第五卷的编译工作。我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在这项编译工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读了一部分与此有关的费希特遗著，尽自己的所能写成的。

作者曾经在拙著《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1995 年）里谈到，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在柏林时期所作的一系列知识学演讲属于他的知识学演变的新阶段，与这个阶段相适应，他当时发表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也具有改变了的哲学基础，而这就是留给现在这本书来探讨的课题。

作者在探讨这个课题时，主要是想破除一种谬误，那就是黑格尔在其《哲学史演讲录》里对于费希特柏林时期的著述活动的评价。我们都很熟悉，黑格尔曾经说过：费希特哲学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早期的真正思辨的哲学；“一是他的通俗哲学，他在柏林对各色听众的讲演以及他的著作《极乐生活指南》都是属于这个方面的。后一方面的著作具有不少

感动人的有教导性的东西，而许多自称为费希特派的人也常常只知道他的哲学中通俗的这一面。这些著作对某些有教养的富于宗教情绪的人是深入感人的讲演。虽说它们的内容有很大的价值，但在哲学史里却不能予以重视。哲学的内容必须得到思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有在他早期的哲学著作里才有。”^① 黑格尔作出这样的评论，当然与他没有见到费希特柏林时期的遗著有关，但是，《论学者的本质》（1806年）、《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6年）、《极乐生活指南》（1806年）、《知识学纲要》（1810年）和《关于学者的使命》（1811年），他是已经看过或能够看到的，而他竟然没有从中发现思辨的东西，发现业已演变的知识学，这却是他视而不见。

随着20世纪初梅狄寇斯版《费希特著作集》的问世，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业已演变的知识学日益受到了重视，黑格尔的那种评价已经发生动摇^②。尤其是，自从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于1962年开始出版以来，慕尼黑学派大力研究了费希特柏林时期的知识学，彻底推翻了黑格尔的那种评价。这个学派的代表赖因哈德·劳特根据笛卡尔关于建立严密的体系所要求遵循的公理化原则^③，认为费希特不仅在耶拿时期建立了一个以自我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体系，而且在柏林时期把这个体系提高为一个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知识学体系，尽管费希特没有把这项最高的成就公之于世，

①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4卷，北京1995年，第309页。

② 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首先当推沙勿略·莱昂（Xavier Léon）著《费希特与他的时代》（三卷本，巴黎1922、1924与1927年）和马提雅尔·圭洛特（Martial Guerault）著《费希特知识学的演变和结构》（两卷本，巴黎1930年）。

③ 《笛卡尔书信集》，巴黎1953年，第557页以下。

但我们已经从 1804 年以后他所作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的这门采用既分析又综合的方法建构的知识学是现象论与真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整体，并且在这门第一哲学的基础上，费希特在建立宗教哲学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工作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①。这个基于研究详尽占有的资料而得出的看法，现在已经在国际费希特研究中得到了确认，黑格尔那种长期流行的评价再也无法成立了。

但很遗憾，在我们国内黑格尔的那种显然错误的评价迄今依然盛行而不衰。因此，作者在前三年酝酿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打算把它的内容定为费希特柏林时期的哲学体系，以期达到预定的目标。于是，作者就沿着费希特知识学演变和发展的轨迹，读了他的一部分重要遗著，然而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目前无法完成这样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因为即使就他的第一哲学来说，从 1800 年 10 月开始，到他 1814 年 1 月逝世为止，他时断时续地重新修订和阐述过 13 次，在这个时期，知识学的思想一直在演变和改进，前后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非常之多，因此，要把他的知识学发展的思路准确地、详细地梳理清楚，恐怕至少也得花费希特花过的一半时间，即 7 年。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便不得不把自己原拟的课题加以修改，仅仅限于阐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刻画知识学演变的概况，以说明费希特柏林时期的知识学演变为客观唯心论的知识学；第二，根据他当时发表的著作，

^① 赖·劳特：《费希特的知识学——对费希特的看法的改变》，载《辩证法》第 8 卷，科隆 1984 年；赖·劳特：《费希特在哲学史中的贡献》，入《理性在现实中的渗透》，诺里德 1994 年。

评述他的以这种知识学为原则的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第三，刻画他的国家学说演变的概况，以说明在知识学的最高原理从自我改变为绝对或理念的时候，他已经相应地从社会契约论转向国家有机论。这样，本书的名称就被改为《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了。

本书的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费希特柏林时期的著述活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位真诚的古典哲学家是如何不屈不挠、艰苦奋斗，以自己的学说致力于人类的进步事业的；第二章——评述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的计划经济模式，揭示此中包含的合理要素，尽管它并不比市场经济模式优胜；第三章——介绍这位先验哲学家的知识学演变的概况，虽然我们暂且无法达到详尽和完备的程度，但任何不抱偏见的读者都会从中看到，他确实建立了一种以绝对为最高原理的新型知识学；第四章——评述三本以这种知识学为基础的通俗演讲集，第一本是代表他的历史哲学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二本是代表他晚期的宗教哲学的《极乐生活指南》，第三本是以一个阶层反映他晚期的道德哲学的《论学者的本质》；第五章——评述他在国难当头时奋不顾身地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我们可以从这部世界名著中看到他是如何把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起来的；第六章——扼要介绍他 1812 年发表的《法学》演讲和 1813 年发表的《国家学说》演讲，读者可以由此看出，他在晚期既有向当时的现实妥协的一面，也有不向当时的现实妥协的一面，前者是他向国家有机论的转变，后者则是他对法国革命理想的坚持。

关于晚期费希特研究中遗留的课题，作者相信，总会有一些年富力强、不畏艰辛和刻苦钻研的学者予以解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和郭大为的《费希特的伦理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分别对费希特柏林时期的宗教学说与道德学说都有深入的研究；李文堂的《真理之光——费希特和海德格尔论 Sein》（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对费希特柏林时期的知识学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谢地坤还会完成他决定撰写的《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从而提出他对费希特柏林时期的国家学说的研究结论。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费希特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必将对我们研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费希特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发生有益的影响。

最后，作者还想谈谈费希特研究的路数问题。虽然我在《费希特著作选集》“编者说明”里讲过，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我们编译这套选集是为了系统地继承这份优秀的理论遗产，但是，我既不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认为真理是惟一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和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就我本人的路数来说，我选择的是从费希特到马克思；我在国内发表的论著里是这么做的，在国外发表的论文里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受到了国外同行的肯定^①。就我们课题组里存在的另一种路数，即从费希特到胡塞尔来说，我不仅不

^① 赖·劳特：《回顾与展望——1995 年那不勒斯第三届国际费希特大会闭幕词》，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

予排斥，而且同样支持了这种取向，因为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思想发展进程，把这个进程刻画清楚，对于我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书末附有《费希特在中国》一文。这篇东西最初是由我写出的，并发表于汉·约·桑德库勒与汉·海·霍尔茨编《辩证法》（科隆 1987 年）第 14 期；它在收入本书时，又由沈真作了大量修订和补充。我们希望这篇报导能向读者表明，尽管费希特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不是一门走红的学问，但在我们国内还是有一些译者和作者，像陈乐民先生说的那样，“无意于参与或制造某种热闹场面，包括参加种种评奖，而只一心作他们的学问”^①。我们希望这项翻译与研究工作还会继续下去，以期对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能有所裨益。

书稿在交给出版社以前，曾经请沈真和李曦过目，按他们提出的有益意见作过修改；送到出版社以后，又由冯春风作过认真的编审，作者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梁志学

北京，2001 年 10 月

^① 陈乐民：《站得住的书》，见《出版广角》1997 年第 1 期。

目 录

前 言	(V)
第一章 费希特柏林时期著述活动概论	(1)
第一节 他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著述活动	(3)
第二节 他作为普鲁士教授的著述活动	(11)
第二章 第一个计划经济模式 ——《锁闭的商业国》	(23)
第一节 什么样的贸易往来在理性国家中是 合法的?	(28)
第二节 关于当代各国的贸易往来状况	(41)
第三节 如何锁闭商业国?	(47)
第四节 这部著作的历史命运	(52)
第三章 知识学演变的概况	(57)
第一节 演变的准备(1800—1803年)	(58)
第二节 明显的改变(1804年)	(65)

第三节 通俗的表述 (1805—1806 年)	(73)
第四节 改进的纲要 (1809—1811 年)	(82)
第四章 以晚期知识学为依据的一组通俗演讲	(93)
第一节 关于《现时代的根本特点》	(94)
1. 历史哲学思想	(96)
2. 对现时代的特点的分析	(111)
3. 公众对这轮演讲的反应	(117)
第二节 关于《论学者的本质》	(120)
1. 学者概念的规定	(121)
2. 正在成长的学者	(127)
3. 已经成熟的学者	(132)
4. 公众对这轮演讲的反应	(140)
第三节 关于《极乐生活指南》	(141)
1. 通向极乐生活的知识学基础	(143)
2. 规定极乐生活的世界观立场	(150)
3. 对于极乐生活的把握与分享	(157)
4. 公众对这轮演讲的反应	(166)
第五章 光辉的爱国主义篇章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170)
第一节 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	(170)
第二节 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	(179)
第三节 这部著作的历史命运	(199)

第六章 国家学说变化的概况	(206)
第一节 关于 1812 年的《法学》	(206)
第二节 关于 1813 年的《国家学说》	(220)
附录 费希特在中国	(232)

第一章

费希特柏林时期著述活动概论

1799年4月5日，这位古典哲学家因为遭到所谓宣传无神论的控告，而被驱逐出了耶拿大学。魏玛政府的封建卫道士们把他视为最可怕的无神论者和雅各宾派，想方设法刁难他、迫害他。德国其他各邦的政府也把他视为一个煽动革命的危险人物，对他严加防范。正当他处境艰难的时候，普鲁士大臣克·康·威·冯·道姆（Ch.K.W.von Dohm 1751—1820年）在耶拿偶然停留，认为魏玛公国教育大臣福格特利用私人信件解除他的教职是背信弃义，建议他到普鲁士寻找避难所，并且保证他在那里不会遇到麻烦。费希特当即给柏林的友人弗·施莱格尔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施莱格尔在回信认为，全家迁往柏林定居是否合适，不能完全肯定，最好的办法还是他个人先来柏林访问，看结果如何再定。费希特听从了施莱格尔的建议，于7月3日到达了柏林。

费希特本来是像一个普通旅行者那样到达普鲁士首都的，但这在柏林当局看来却是一种重要政治行动。第二天上午，普鲁士政府就讨论了这一情况，决定对这个可疑的来人严加监视。结果，很快就有警察出现在他的住处，对他进行

盘问；他收到的信件也往往被特务拆开，遭到了非法检查。而且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威廉三世从外地视察工作返回柏林以后，就费希特在此的居留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指示：“如果费希特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并且不参加危险的结社，则可允许他在我的国家里平安地居住下去；如果他真与仁慈的上帝为敌，仁慈的上帝就会惩罚他，而这与我毫无关系。”^①

在饱尝了魏玛政府的惩罚以后，费希特又不得不生活在普鲁士政府的监视之下。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找普鲁士枢密顾问卡·弗·拜梅（K.F.Beyme 1763—1838 年）面谈，说明自己的来意。这位主管内政的枢密顾问向他表示，国王对于涉及这类问题的原则将持坚定不移的态度，只要遵守这些原则，他不仅不会受到阻碍，而且他在柏林定居也会受到尊重，被视为光荣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此后，费希特的生活处境日益有所改善，他已经不再深居简出，而是一方面撰写自己原来打算要写的《人的使命》，试图从哲学开始过渡到宗教；另一方面参加共济会的活动，试图以自己的哲学思想推动共济会的改革。但无论在著述活动中，还是在社交活动中，他都循规蹈矩，开始变得温和而拘谨起来，从而打消了普鲁士政府对他的疑虑。同时，经过了将近半年的生活体验，他自己也觉得在柏林可以摆脱耶拿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而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著述活动。于是，费希特就在 12 月返回耶拿，于 1800 年 3 月举家定居于柏林了。

^① 《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 4 卷，第 105 页。

第一节 他作为自由职业者的著述活动

费希特在柏林定居的前五年，是依靠写作和演讲来维持他的家庭生计的，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称为自由职业者。他与图宾根出版家约·弗·哥达（J.F.Cotta 1764—1832 年）签订了合同，请这位出版家发表他撰写的书稿；他与柏林书商约·丹·赞德尔（J.D.Sander 1759—1825 年）达成了协议，请这位书商办理他发表演讲的事宜。不过，他决不是单纯为了糊口而写作和演讲的，而是要依靠获得的生活条件，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如果我们用他 1794 年《论学者的使命》中提出的原则来衡量他的著述活动，我们则可以说，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提出的问题始终是：“这是真实的吗？这会造人类之善良和高尚吗？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而绝对不是：“人们会乐于听取吗？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得到多少金钱，或者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或者得到哪个美女的微笑？”^① 这种誓死追求真理而决不曲学阿世的治学精神，即使在生活来源没有什么可靠保障的情况下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一，从 1800 年 3 月到同年 8 月底，致力于研究国民经济学，完成了《锁闭的商业国》一书。这项研究工作是从普鲁士国家长期要求限制对外贸易和当时讨论采用纸币的现实出发的，但研究的结果却远远超出了满足这类实际需要的

^① 《费希特全集》，第 I 辑第 3 卷，第 62 页。

范围。在费希特看来，这里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根据经验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而在于人类历史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他从耶拿时期业已阐明的有限理性存在者之间的法权关系出发，认为各个社会阶层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应当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方面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经过对这种关系的研究，他制定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按计划发展的国民经济模式，说明在完全锁闭对外贸易、建立起这种经济模式的国度里，将既不会有不劳而获的懒汉，也不会有劳而不获的穷人。这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提出的第一个计划经济模式。当时的普鲁士财政与贸易大臣卡·奥·冯·施特吕恩塞（K.A.von Struensee 1735—1804 年）主张禁止外国商品输入、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和采用纸币，费希特写的这本书就是公开献给他的。

第二，费希特并不是一个纯粹讨书斋生活的学者，而是从来都力求将自己得到的真理付诸实现。他在个人访问柏林时参加了共济会，那时该会在当地的大师伊·奥·费斯勒（I.A.Fessler, 1756—1839 年）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他入会的仪式上致辞说：“欢迎这位学养有素的兄弟来到我们的圣地，在这里，受到压迫的无辜、遭到误会的德性和受到迫害的真理不仅必定会找到避难所，而且也必定会受到尊重。”^① 因此，费希特到柏林定居不几天，就接受了费斯勒的邀请，决定从 4 月到 6 月给共济会作 14 次演讲。在这些演讲里，他主张把共济会办成一个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机

①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 2 卷，第 243 页。

构，以纠正市民社会中的那种人的片面发展，并且针对共济会中存在的问题说道：“将要摆脱权威的一切束缚的共济会会员，决不会让自己在这里套上新的秘密枷锁！力求获得纯粹人类的教养和力求到处纯粹生活于精神中的共济会会员，决不会让自己在这里束缚在一种新的字眼里！拒绝任何行会精神的社团，自身决不会变成一个行会！”^①但是，在讨论共济会的纲领与章程时，费希特则与费斯勒等人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鉴于自己的哲学思想无法得到采纳，费希特于7月4日毅然宣告退出这个社团。

第三，不断讲解、修订与阐述知识学。这是一件艰巨复杂、曲折多变的工作。还在定居柏林的前夕，费希特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在近期内从事这项工作的计划，一是写一部阐述知识学基础的通俗著作；二是写一部重新阐述知识学的专著。1800年8月《锁闭的商业国》完稿以后，他便奋力撰写那本通俗著作，即《就最新哲学的本质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明如白昼的报导》。10月中旬，结合着给银行家萨·莫·莱维（S.M. Levy 1758—1813年）单独讲授知识学，开始了重新阐述知识学的工作，并且在斯图加特与图宾根《总汇报》上发表了进行这项工作，以期来年春天将《用新方法阐述的知识学》公之于世的预告。但是，由于赖因霍尔德从知识学倒向克·哥·巴尔德里（Ch.G. Bardili 1761—1808年）在其《第一逻辑纲要》（1799年）中宣扬的粗俗二元论而与这位墙上芦苇式的人物发生的论战，尤其是由于费希特看过《先验唯

^① 《费希特全集》，第I辑第8卷，第460页。——这些演讲在由费斯勒等人以《共济会的哲学》为题发表时，已经被他们作了篡改。